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高华遗作：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中国翻译之现状，兴耶？衰耶？

网络文学的过去与现在

两岸出版和故宫的合作

历史的颠覆

「我向党中央讲真话」

为宋庆龄辟谣

中国在南海为何望油兴叹

美国对中国展开的网络外交

Mook

第二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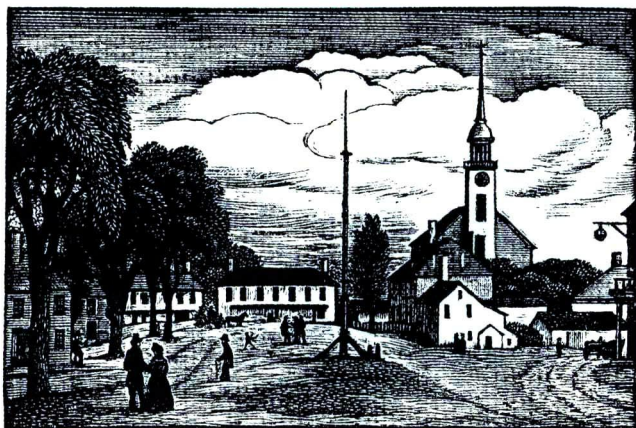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7

M^{卷二十七}悦读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二十七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91-7723-6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049号

悦 读MOOK (第二十六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7723-6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卷首语

一位素昧平生的读者日前给编辑部来信,说他在一次旅途中偶然发现一本《悦读》,翻阅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自小喜欢读书,爱逛书肆,却从未见过这本杂志书,媒体上也未见有关的介绍。何故?

这位读者语重心长,点到了《悦读》创办以来一直未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宣传和发行工作尚不理想。尽管连年来通过口口相传,邮购等途径,读者和作者队伍都在不断扩大,但距办刊的要求仍有相当距离。借此机会,说上几句。

《悦读》已办了二十七卷,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读者。这是一本有关书的书,杂志的特点是“杂”,应尽量想读者之所想,供读者之所需。在内容上努力做到丰富多彩,触角广泛,信息量大,以助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增长智慧,开阔视野,加深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

举一个例来说,近来常听到人们感叹,现实生活太离奇了,较之文艺作品更显诡谲多变,出人意料,难以想像。其实,多看些书,多作些思考,还是能知其脉络的。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此话振聋发聩!这也许是当今发生的许多问题的渊源,也是影响当今社会前进的不可忽视的两个原因。然而,什么是“‘文革’的错误”,什么是“封建的影响”,人们未必都了然于心,也决不是听几个报告,发若干议论,就能知其所以然的。只有通过大量的事实,当事者真实的回忆,才有可能痛定思痛,提高认识,肃清流毒,吸取教训,在实践中不再重蹈覆辙。

在这方面,媒体应尽自己的责任。不妨多留下些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以供人思考。我们也应该为此而作出努力!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资中筠 / 005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高 华 / 012
	中国翻译之现状,兴耶?衰耶?	黄源深 / 025
	不做“网络移民”,便成“文化遗民”?	
	——网络文学的发展态势和精英批评的态度方法	邵燕君 / 035
人 物	续貂录 / 关于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一封信	虞非子 / 046
	握 别——我与季思师	郭启宏 / 054
	纪念路翎:一位夭折的天才小说家	
	——为路翎九十岁冥寿而写	邹 霆 / 062
	常风与抗战前后的中国知识界	周 言 / 067
闲话出版三十年	涓滴之水可以成江河	
	——《国宝荟萃》的出版与两岸故宫的合作	陈万雄 / 078
忽然想到	历史的颠覆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 082
往 事	鸿爪掠影(三)(之七)	王学泰 / 087
	难忘干校里的逍遥岁月	
	——对学部“五七”干校的追忆与反思	徐兆淮 / 094

文史杂谭	近代史中的老牌《申报》	萧文泉 / 106
书与插图	悲剧的诞生	汪家明 / 110
艺苑杂谈	为什么《一次别离》获奖	彭小莲 / 118
海外书情	珍贵的文学史料——老派的原子间谍—— 乔伊斯的隐秘世界——变迁中的罗马 城——叛逆的才子——不息的生命变 迁——古书的现代命运——面对大自然的 拜伦	/ 122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美国一些 学者的如意算盘——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富豪计划送子女出国留学——中国学生增 加使美国大学回到了淘金时代——一万三 千个学童每天跨境到香港读书——农村高 中教育的欠缺导致我国人口素质的下降	/ 129
	► 历史往事 ◀ “我向党中央讲真话”	林 雪 / 132
	为习仲勋平反	薛庆超 / 137
	老兵返乡	毛剑杰 / 140
	► 读者点题 ◀ 为宋庆龄辟谣	何大章 / 143

► 人物志 ◀

- 温家宝总理引用古文选登 / 154
- 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刘伯承 顾保孜 / 157
- 邓拓与毛泽东 李 响 / 161
- 奉化认祖 蒋孝严 / 165
- 宋美龄以静坐养生 窦应泰 / 169

► 国情点滴 ◀

- 贫富差距源于建国之初 杨奎松 / 173
- 统计数字的“谜局” 李 松 / 175
- 中国在南海为何望油兴叹 余胜海 / 177
- 中国制造凭什么在国外比国内便宜 刘 洪 / 180

► 信息荟萃 ◀

- 外国是如何管理公车的？——不同的校庆——台湾的“第一千金”——精心办好“两会”——作家代笔风波——中国坐上了全球艺术品市场头把交椅 / 182

► 四面八方 ◀

- 照片背后的故事 段宇宏 / 191
- 美国对中国展开的网络外交 东 鸟 / 194
- 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 张聿温 / 197
- 中国皇帝短命多 赵 勇 / 198

► 养生之道 ◀

- 粉碎谣言——
- “晚上一杯奶,有个好睡眠” 游识猷 / 201
- 维生素 C 能预防和治疗感冒吗? 秋 秋 / 202
- 别被酸性体质忽悠了 刘 景 / 204

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资中筠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这应该算是中外关系史界的一项带有开创性的活动。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摆脱纯粹以“帝国主义侵华史”来概括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套路,以新的、客观的、全方位的视角探讨中美关系史的一次盛会。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单位都是在新时期应运而生新成立的。当时中美建交才五年,两国之间已经问题层出不穷,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到会有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余名学者,从年近古稀的资深学者到尚未毕业的硕士生,济济一堂。气氛空前活跃。会上竟然有年轻学生与老教授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极少有的现象,足见当时的自由气氛。

在短短几天会议中,有一个问题不断

凸显出来,就是档案资料问题。毋庸置疑,凡治史者,都离不开档案。而我国近代史的档案查阅困难重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接触到国外的图书档案,愈加痛感其便捷与我国成鲜明对比。本人在短短的几年中对此就有亲身体验。

美国的档案解密制度

美国依法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后改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部门出版,全世界都可订购。我国当时能进口这套资料的只有极少数几家图书馆。二〇一一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FRUS)》举行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档案始于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还很小,外交规模也有限。实际上,临时性的解密从开国以来就有,那时每当与外国签订条约需要国会批准,除提供条约文本外,还须附

谈判经过的原始文件。不过一八六一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仅是个案,而是全部外交档案;不仅对国会,而且对公众公开,媒体都予以报道。其特殊动因是南方闹分裂,正进行争取外国承认的活动,国务院需要向公众交代在外交上为抵制这些活动做了哪些工作。因此一八六一年那一卷被定为FRUS首卷。开此先例后,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或主动,或应国会要求。那时还不一定要等三十年之后。后来美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保密制度日益正规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的制度。一九六六年约翰逊政府通过《知情权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国通常按字面直译成“信息自由法”,我认为“知情权法”更准确)。该“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档案的解密从“需要”变为“权利”,就是说,过去是因为某种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现在是确定了解真相为公民的权利。因此定期公布档案是政府的义务。原来英国早已有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的法律。美国援英例,此法也适用于一切政府部门的档案,时限不等,不过只少于,不会多于三十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历史办公室”,由专人负责整理分类,到期必须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继续保密的(例如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会引起外交纠纷的敏感问题等),必须有法可依,经过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几句话因故尚不便公开,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虚点标出,明告查阅者:此处有省略(我就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看到过这种文件)。也就是

说,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诉查阅者。根据《知情权法》,有关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项暂未解密的档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请,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档案馆或有关部门。据我了解,已经有不止一起学者因写书需要而打官司胜诉的案例。

所以史学研究的发展,往往跟着解密档案走,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兴起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一九八五年最新公布的就是一九五五年的材料。

本人在美查档案经历

我一九七九年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图书馆发现了FRUS,如获至宝,像发现金矿一样。那个图书馆进书及时,一九四九年的已经上架。我钻进图书馆,详细翻阅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那几卷,外加历年国会记录等等,经过大半年时间,写出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台政策的详细决策过程,在当时是国内第一篇根据最新外国解密档案写成的有关这一热点问题的论文。由于材料很多,我决定写一本书。一九八二年正好有机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档案馆,无尽宝藏,任你挖掘。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曾专程到华盛顿去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那时档案馆尚未迁入新址,旧馆设施陈旧,比较拥挤,在密密麻麻的卷宗架旁边摆了一些长桌供阅览。不过手续十分方便,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敬业而热情。接待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对我

研究范围的资料如数家珍，查找效率极高。他们的业绩是以查阅资料的人次和数量计算的。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我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录上有，但是标明此件暂不公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竟怂恿我根据《知情权法》去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开放，如不允，还可到法院告他们。我大为惊讶，说外国人也能告吗？他说能，已经有先例，有一位苏联学者告过，而且胜诉。此前我知道有美国学者运用此“法”胜诉，并根据争取到的档案写出一本书，但是不知道此权利还包括外国人。我国的档案管理者与“机要员”混为一谈，以保密为己任，养成一种心态，越少让人知道越好。而美国相反，他们站在档案馆立场，越多公开越好，因为这是他们的财富。这一遭遇使我大开眼界。当然我不至于因看档案而打异国官司。还有一事令我意外，我在华盛顿只呆两星期，由于国家档案馆正进行内部整理，在我逗留期间有一部分我要的卷宗不在架上。谁知我回普林斯顿不久，又接到档案馆那位接待我的老先生来信，告以现在这部分档案已经上架，你可以过来看了。这种服务态度真使我受宠若惊。

在国内的遭遇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保密”为主。而且“机密”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文革”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



资中筠先生近影

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后门”，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批件”，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就不必看了吧！”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

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辞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内部”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1987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1987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

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如果时间比作金钱的话,从性价比来说,是不上算的。我庆幸自己及早逃离,没有把那几年宝贵时光陷进去。

上书言事

再回到一九八五年的会议。与会学者每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档案问题大倒苦水。特别是,外国学者看中国档案反而比中国学者得到更多机会,令人着实意难平。有人举例:“西安事变”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一个课题,中国学者多少年来看不到有关的档案。但是有一位常来常往的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邀请某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赴美访问一次,就取得了阅读西安事变档案的许可,从而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论文,提出新的看法。中国学者对此即使质疑,也无强有力的依据。这一例子使在座者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认为再这样下去,连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都与外国学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向有关领导上书,力陈利害,争取档案依国际惯例开放。经议定内容,本人被公推为执笔人。现在还留有底稿。主要段落如下:

乔木
同志：
兆国

……(介绍本次会议的情况略)

就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而言。近二十年来,美国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卷帙浩繁。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从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所能得到的依据主要也仍是美国的档案或引自美国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这样,我国学者总是处于劣势,跟着别人后面。在掌握美国材料方面,我们当然无法与美国学者抗衡,而美国人却往往引用我们既不能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据称是我国的(包括清、国民党时期以及我党成立之后的)原始文件档案对我国的历史、情况、政策肆意解释。致使一些片面反应美国人偏见的论点在国际上流传甚广。……国民党方面已有意识地向其有关学者开放部分档案,并已成书多种。最近台湾报刊有文章建议加速对这一段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要求当局开放史料,以免在“美国或中共方面出版许多歪曲历史的解释后才图对策”云云。说明国民党方面已在有意识地与我争夺对近代史的解释权,并企图造成先入之见。

此外,有个别外国人或外籍华人通过某种特殊关系即可查阅中国学者所无法接触的材料,结果珍贵史料首次发表的权力落入外人之手,往往由他们做出我们不能同意的解释,在国际学术界抢占权威性的地位。这种现象不但使克服种种困难从事艰苦的学术工作的我国学者为之寒心,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政治上影响极为

不利。

以上情况也适用于一般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一名美国负责外交档案解密工作的人员曾对我国学者(按:此学者即本人)说:“我们根据法律必须公布档案,而你们什么都保密,表面上似乎你们占便宜,但是从长远看,历史将对你们不公平,因为以后的世界史都是我们一面之词。”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何况就在目前,对我们不利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

……

根据目前现实情况,我们建议办法如下:

1. 主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档案工作人员的考绩、奖惩应把服务查阅的人次列为标准之一。

2. 据了解,现在有的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在编印各种档案(《资料汇编》),陆续出版,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档案资料浩如烟海,工作人员人手有限,……编印出版《资料汇编》不能代替原始材料的开放。

3. 目前主要有史料分别存放于第一、第二和中央档案馆,其机密程度不同,可区别对待……

(以下4~8点提出一些具体办法,略)。

这件事看来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影响,却关系到当前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学术领域的现代化,以及教育子孙后代的问题。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深感一个多

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备受外侮之痛,如今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情况下,面临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在文化方面的挑战,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愿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与我们今天国际地位相称的贡献。特此恳切陈辞,希望中央和各级有关领导同志体察,并给予切实的关注。

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全体人员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是一份中规中矩、政治正确的“奏表”,最终目的是争取档案开放,“对我政治上有利”,是能够打动“上面”最正当的理由。今天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者恐怕不会把与外人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作为研究的宗旨。不过直到今天,不论是上呈的奏折,还是下达的敕令,恐怕还是以“对我政治上有利”为准绳,例如发展文化是为了在国际上显示软实力,等等。至于我自己,自那时以后,基本上摆脱了写此类“奏折”的任务,是一大幸事。

此件上达后,据说胡乔木有批示,我没有见到,但被告知,批示仍重申了他过去的指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可以开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暂缓。换言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与之有关的档案就属保密之列。不论怎样,这份报告连同批示正式传达到有关部门,包括档案馆,的确产生了效果。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据说有的档案馆还组织了对这份文件的学习讨论。最明显的是南京的第二档

案馆改进管理方式,加速整理积案,加强了服务于查阅的观念。这里所谓“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二档馆是民国时期建立的,建筑设计十分讲究、科学,在尚未有空调的情况下,做到防潮、四季保持恒温。其中的档案一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留在南京那部分原来也是排列有序,有完整的目录。但是后来,主要是在“文革”期间,为体现政治立场,把卷宗题目都改了,例如原来编目有“总统府”,就改成“蒋匪”,原来“××部”,则加“伪”字,等等,而且里面的细目也打乱了,所以同类文件可以放在不同卷宗内。总之,体系乱了套,查找十分困难。要重新还原,按照专业的档案编目、整理,确实需要费不少功夫。后来我很少去那里,据称现在查阅已经很方便了。

事隔近三十年,今天我国档案开放的程度已经大有进步,而且已经正式有了三十年解密的规定。有的地方的档案开放程度还要宽。史学界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写出的佳作迭出,成绩斐然。不过大多数根据还是境外的档案,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公开的资料。在我国,在实践中还有种种阻力。我个人就碰过两个钉子:

一是我写《财富的归宿》一书时,涉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之事。福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的,主管单位为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一九八六年双方领导签有正式协议,当时我就知道此事。上世纪末,我远涉

重洋,在纽约福特基金会总部的档案室中查到这份协议的英文本原件,回来后希望从社科院找到中文本。我原以为很简单,就在本单位。却不料与有关办公室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他们那里,但是经请示领导,不能查阅,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于是我在书中只好据英文本转译成中文。按理说,这一协议当时就是公开的,根本不是机密文件,只是一旦“归档”,就“侯门一入深似海”了。不许查阅,也不知根据什么规定,是什么心理作祟。

另一次是我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和平运动,有些记忆不准确,想查阅当时的档案,如今存在对外友协。开始接洽时,管理人员友好热情地接待,并提供了卷宗目录,我列出了要查的卷宗清单,其中不少就是我自己原来写的报告文件,请他准备好,约好下次再去。

谁知几天后接到通知说,经请示领导,此类档案不得查阅。按理说,早已超过三十年期限,也不知根据何种理由,何种规定。我国没有《知情权法》,无法抗诉。不过这不能妨碍我凭记忆写作,只是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无法保证。至于中共党史的档案当然更加是禁区。这种把历史档案视作禁脔的主导思想就是不承认公众有知情权,一切以掌权者制定的官史为准,不让普通人知晓内情,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官史实在已难取信于人。各色人等的回忆录纷纷出台,人们对此兴趣极浓,尽管许多事说法不一,真伪难辨,有此野史交叉证明,任凭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相对来说比官史可信的成分还高些。有朝一日,能出台一部“知情权法”,并且真正能落实,恐怕不只是历史学界的企盼。■

补白

梁启超自省

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讲演时,曾有如下的知悔之言:“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抛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作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作恶。”此前,梁氏还自省道:“吾尝自谓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高华先生撒手西去。对这位被称为自甘贫贱而能坚持学术操守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的英年早逝,学界和读者表示深切的悼念。报刊杂志上的纪念文章连绵不绝。现征得高华先生家属的同意,将这篇高华先生生前多次修改,尚未发表的文章,首次刊登如下。

——编者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 高 华

一、“五四”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推动民族意识的增长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强烈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独立国家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诉求。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的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

技、制度。

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十九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作过悲观性的评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过,“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力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

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了加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吸取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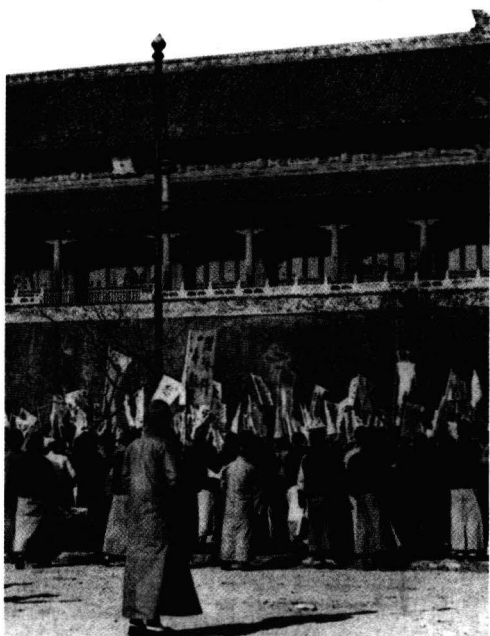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正阳门城楼被毁。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到更高的层次。一百五十年来，大致有下列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到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五年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层次。甲午战败标志“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此即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政

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最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二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定“二十一条”，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



1919年5月4日,示威者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

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如果说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五月

四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二十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一九二四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